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汇报提纲》《二十条》的“批判”

四川人民出版社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汇报
提纲》、《二十条》的“批判”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成都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汇报
提纲》、《二十条》的“批判”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字数 37 千
1977年8月第一版 197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3118·122 定价: 0.13 元

目 录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

..... 向 群 (1)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雷化时

——推翻“四人帮”对《汇报提纲》的诬陷

..... 中国科学院理论组 (25)

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

——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

..... ~~国家计委七批判组~~ (39)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

向 群

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加快了他们的反革命步伐，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八月，他们趁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之际，倾巢出动，掀起一个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在江青直接主使下，他们指令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选辑所谓“批判文章”，并把这三个稿子作为“附录”（实则只有《论总纲》附了初稿的全文，《汇报提纲》只附了第一稿的第三部分，《条例》只附了最初几个草稿中的一个稿子，而且不是原文，是个错漏很多的传抄本），分别编成三个小册子，诡称这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印了数千万册，发到全国。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他们把这三个稿子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妄图把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打成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式的人物，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他

们把这三个稿子打成“三株大毒草”，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根本没有说过这三个稿子是毒草，更没有说过要批判。他们给这三个稿子戴上如此吓人的大帽子，完全是欺骗舆论，制造混乱，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四人帮”把《论总纲》说成是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授意炮制”的，说他“把这篇文章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拳头”。这些说法，纯属捏造。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先后作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疯狂反对和歪曲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这是当时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论总纲》这篇文章，正是从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宣传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宣传一九七五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国防工业问题、农业学大寨问题以及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问题所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阐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等方面的问题。这篇文章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上旬的初稿中，有些提法不妥当，特别是用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在十月中旬的二稿中，就已删去了这个提法，因而题目也已改了。

“四人帮”为了反对宣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诬蔑《论总纲》是“大毒草”，给它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他们攻击《论总纲》是“一

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是“翻案复辟的自供状”、“翻案复辟的铁证”等等。总之，在他们看来，《论总纲》是搞“复辟”，而他们则是“反复辟”。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香花？什么是复辟？什么是反复辟？人民群众是最有鉴别能力的。《论总纲》虽然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全文揭露和痛斥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与“四人帮”的愿望正好相反，尽管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论总纲》实行反革命围剿，但是广大群众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是什么毒草，而认为那些攻击《论总纲》的文章，才是真正的毒草。

现已查明，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姚文元在一份《论总纲》的稿子上，写了四十七条批语，并“指示”他们的写作班子“程越”、“梁效”等炮制批判《论总纲》的黑文，恶毒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反革命的批语和文章，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从反面说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论总纲》，而是“四人帮”自己。

《论总纲》在阐述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坚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充分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复杂性。文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如果对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就会被一些错误的口号所迷惑，忘记党的基本路线。

对于《论总纲》的这些论述，“四人帮”如芒在背，不能容忍。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是一伙以伪装形式出现的反革命的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他们根本歪曲毛主席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中提出的**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别有用心地搞什么“全面专政”、“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妄图对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外的一切阶级、一切领域、一切人实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为了推行这条极右路线，他们采用了种种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法，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正如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

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四人帮”虽然在自己脸上涂上了一层层“左派”、“革命派”的油彩，但是他们非常心虚，非常害怕人们戳穿他们的伪装。姚文元一看到《论总纲》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按捺不住，在旁边批道：“什么‘复杂性’？”“来了！”在看到《论总纲》中说“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的时候，又批道：“你们才是这样。自画像。”他们如此敏感，确是活灵活现地“自画”出了他们做贼心虚的心理状态。

《论总纲》在批判林彪时说，毛主席正是根据林彪的实际行动，看穿了他在“极‘左’”词句掩盖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姚文元别有用心地在旁边批道：“‘左’？”随后，他在修改“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一文时，又无中生有地给《论总纲》加上了“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左’”的罪名。“四人帮”不仅害怕人们戳穿他们的伪装，而且对人们戳穿林彪的伪装也很反感，这说明他们使用的反革命手法是袭用林彪的老谱，他们同林彪本来就是一伙。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用“左派”的假面具

掩盖极右派的实质，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政治上、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党内外阶级敌人如果以赤裸裸的极右面目出现，就根本站不住脚，所以他们往往戴上“革命”、“左派”的假面具，用这种诡计来欺骗人民。林彪所说的“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就一语道出了这种诡计。正如列宁所说：“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选集》第2卷第337页）斯大林在讲到同联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等人作斗争的经验时也指出：“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8页）托洛茨基主义是“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4页）

由于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具有这种特征，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在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总结我们党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时就强调指出，识别阴谋集团的重要性。毛主席说：“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

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0—151页）毛主席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不仅要通过现象而且要通过假象去认识本质。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假象同一般现象的区别，在于它从反面反映本质，比现象反映本质要更加曲折。所以，通过假象认识本质更不容易，我们必须花气力去学会这种本领。随着革命的发展，毛主席又总结国际国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经验，反复要求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且着重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不仅向我们提出了这个任务，而且为我们制定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个著名的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党内走资派的基本原则。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论他们用怎样的革命词句

来伪装自己，都是能够被识别的。他们既然事实上在搞反革命，就必然产生革命词句和反革命行为的矛盾，也就是革命的伪装和反革命的实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他们不可能克服的，因而他们不可能不露出破绽。人们抓住他们的破绽，就可以识破他们的伪装，认清他们的本质。我们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说明了这一点，同“四人帮”的斗争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四人帮”就是一伙用“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黑帮。当他们摆出“超级革命”的架势，把革命的口号歪曲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反革命的活动干得最凶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人民，就已经一步一步地识破了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

《论总纲》在讲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说：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识破了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也从他们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很清楚，

《论总纲》这段话只是对当时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一种分析，并没有具体地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指的是谁。但是，“四人帮”对此异常敏感，极为恼火。姚文元在他的批语中质问：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指谁？”随后，他在修改“程越”的文章时，又亲笔写了这样一段奇文：《论总纲》所说的“反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指的“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十分熟悉，这两个称号一向是“四人帮”伪装自己，欺骗人民的幌子，因而也就是说指的是他们自己。姚文元在这段奇文中，既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打自招地供认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的这种自供是合乎事实的。现在全国人民都已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确是一伙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

二

《论总纲》在论述安定团结问题时，一开头就写道：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我们学理论，抓路线，就是要促进安定团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姚文元对此批道：“革命呢？”这条批语说明，在“四人帮”看来，谁要说实现安定团结，谁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实际上，他们根本反对实现安定团结，妄图要无休止地乱下去，搞乱无产阶级的天下。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大乱，越乱对我们越有利”。

“四人帮”的这些谬论，一笔抹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矛头是直接对着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伟大战略思想。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把毛主席这个指示接过去，加以歪曲，千方百计地搞乱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两种阶级内容不同、性质不同的乱。一种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去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打乱他们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修正主义统治，使他们土崩瓦解，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另一种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制造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搅乱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这是他们从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前一种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前，是我们的斗争所需要的；后一种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必须加以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反对打倒一切。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和制止阶级敌人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混乱。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并且反复强调，要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革命人民的团结，警惕阶级敌人的分裂活动。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

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针对社会上流行着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复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警惕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搅乱我们的阶级队伍，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毛主席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实际上都是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尖锐批判。

当我们党取得了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以后，毛主席及时地在党的九大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又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到一九七四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粉碎了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这时，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促进安定团结，以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准备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是，“四人帮”不要安定团结，而要继续大乱，彻底大乱。他们根本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一笔抹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此作为还要继续乱下去的借口。他们把毛主席的批林批孔的指示接过去，利用

评法批儒，掀起了一个攻击和陷害周总理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革命逆流。他们在全国不少地方继续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组织帮派体系，更加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他们要继续乱党、乱军、乱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安定团结的指示。这是对“四人帮”的当头一棒。但是，“四人帮”悍然不顾毛主席的严重警告，继续坚持他们的“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

《论总纲》遵循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针对“四人帮”反对和拒不宣传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的严重情况，论述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论述了安定团结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文中指出，促进安定团结，才能在全国造成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局面，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但是，实现安定团结，必须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关系，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从这个情况出发，《论总纲》强调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要彻底揭露阶级敌人在“造反”、“反潮流”的革命旗帜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在那些被阶级敌人控制的地方和单位，要彻底揭露和坚决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安定团结。这些论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四人帮”感到这些论述的锋芒是 对 着 他 们 的，所以一口咬定所有这些都 不是 讲的阶级斗争，都是否定阶级斗争，否定革命。由此可见，“四人帮”所说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就是保护和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依靠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等的力量，向无产阶级进攻。

阶级斗争和安定团结是纲和目的关系，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正确地处理阶级斗争和革命团结的辩证关系，坚持斗争和团结的统一。在同阶级敌人的激烈斗争中，毛主席总是强调团结对敌的重要性。毛主席指出，要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每当革命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以后，毛主席又总是进一步提出增强团结的任务，以便从政治上、思想上、物质上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力量，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这个一贯思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及时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